

珞珈史学文库

LUOJIA SHIXUE WENKU

武汉大学文科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教育 士人 社会 元史新探

申万里 著

JIAOYU SHIREN SHEHUI
YUANSHIXINTAN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武汉大学文科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教育 士人 社会

元史新探

申万里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 士人 社会：元史新探 / 申万里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10308-4

I. ①教… II. ①申… III. ①中国历史—元代—文集
IV. ①K24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476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教育 士人 社会

元史新探

申万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308-4

2013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3/4

定价：70.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

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

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 年 2 月

自序

本书收录的 16 篇论文是我 2002—2008 年期间部分论文的汇编。论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元代教育、元代士人、元代社会。

教育史的论文较多，有 8 篇，一些论文的篇幅也比较长，大部分为 2006 年以前完成，是我进入元史学界以后最早的一批研究成果。这几篇论文中的一些部分已经收入我 2007 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元代教育研究》，由于受到学术专著体例的影响，这些部分还不能完全反映单独的学术论文中所体现的学术观点与学术思路，因此选择这 8 篇文章收入本书。

可能是由于我大学读的是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在中学工作数年，对中国教育可谓情有独钟，学习元史以后，决定将元代教育作为以后研究的首要内容。在阅读前人关于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元代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以后，感觉当时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还存在很多明显的问题，于是决定在博士论文中以元代为例，探讨这些问题，为解决国内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思考。

2002 年我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工作，教学之余，开始对教育史问题进行全面思考，陆续写成十余篇论文，本书收录的这 8 篇论文，我认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解决了下面一些问题：第一，教育史的基本概念，如“庙学”。第二，教育制度。目前国内教育史学界对教育制度的研究存在较大的问题，比如对小学到大学的二级学制问题缺乏必

要的考察；学校的祭祀问题被人为地归入文化史，扼杀了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的“庙学合一”的学校运行特点；游学问题分布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广泛，但缺乏必要的研究；学校的管理系统问题尽管为大多数教育史论文或专著所涉及，但缺乏系统的考察与论述；学官制度是有别于中国古代一般官制的一种特殊制度，学术界对这一制度几乎没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第三，学校的建筑布局问题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问题，国内教育史学界一般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让人费解。我在《元代教育研究》中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教育史学界的回应，希望这本论文集集中收入的这些论文能引起学术界的反响。

元代士人问题是我在研究教育的过程中逐渐扩展研究领域的结果。这本论文集收录4篇关于元代士人的文章，分别对宋元更替之际士人的处境与社会角色的转变、士人社会网络、士人与乡饮酒礼以及士人与关羽崇拜等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收入本书的《宋元明时期关羽崇拜新探》一文，是我为参加“2007年海峡两岸关公及三国文化论坛”而写的，该文从长时段考察了关羽从人到神的转变过程，通过宋元明士人的造神运动，探讨了其对传统文化中“忠义”、“勇武”等因素的诉求，该文还考察了关公文化由精英向一般民众的传播过程。

元代国家与社会问题是我近年来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论文集收入2篇相关论文。《元代的粉壁及其社会功能》一文以粉壁为视角，探讨了元代信息传播的特征以及官民之间的信息交流问题。《元代应昌古城新探》则是从田野考察出发，探讨元代草原城市内部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发展。

最后2篇人物传记是应台湾《历史月刊》之邀而写的，由于不容易找到，故也收录到这本论文集中，供读者参考。

另外，所收论文中肯定还会有不少缺点错误，恳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录 Contents

元代庙学考辨	1
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	14
元代游学初探	29
元代儒学建筑布局考述	50
元代文庙祭祀初探	98
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	136
元代庆元路书院考	151
元代江南儒学的管理系统考述	173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202
宋元乡饮酒礼考	236
元代的粉壁及其社会职能	263
元代儒士许衡的社会网络	283
元代应昌古城新探	315
宋元明时期关羽崇拜新探	328
元皇太子真金的曲折命运	362
元朝末代皇后奇完者忽都	372
作者著述列表	382
后 记	385

元代庙学考辨

何谓庙学？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解释为：设于庙内之学校。那么，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元代庙学的实际情况呢？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日本学者牧野修二认为：“庙学（元代）即郡县学，它是以文庙（先圣庙、宣圣庙、孔子庙）为精神中枢，并依附于文庙而设置的儒学。”^①学者胡务也认为，庙学即儒学^②，是依附于孔庙以传授儒家理论为宗旨的学校^③。类似的观点在宋代教育史研究中也有反映，顾宏义在研究了宋代两浙地区的教育制度以后，就认为宋代在州县学外另设庙学的说法“大可商榷”，庙学就是当时的州县学。^④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此不同的意见。程方平在《辽金元教育史》中认为，元代存在着“确确实实的庙学”，它与地方学校不同，是“一种类似佛教俗讲的教育形式”，它是“以祭奠为中心的一种暂时性的教育，类似于今天的讲习班、讲座等形式”。^⑤欧阳周著《中国元代教育史》、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⑥林拓的《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在承认元代庙

①〔日〕牧野修二：《论元代庙学和书院的规模》，《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②胡务：《元代庙学的兴建和繁荣》，见《元史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胡务：《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见《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④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⑤程方平：《辽金元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⑥参见欧阳周：《中国元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学与官学合一的同时，也认为元代庙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庙学是“以祭奠活动为中心，具有短期讲习性质”的教育形式。^①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则有专门篇幅讲述关于元代存在“与地方学校不同”的庙学的理论。^②那么，元代的庙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形式，它与儒学的关系如何？

一

元代有关庙学的史料很多，笔者仅在元人文集以及各地金石碑传中，就检索到很多处，现选出几条摘录如下。

张伯淳《处州路重修儒学教授厅记》：“余友天台童君教处学三年，废必兴，弊必革……于是庙学严整。”^③

陆文圭《江阴重修学记》：“皇庆改元暨阳，庙学告成，孰成之，东平曹侯也。”^④

程钜夫《大元国学先圣庙碑》：“至元四年，作都城，画地宫城之东为庙学基……成宗建庙学。”^⑤

卢摯《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作新孔子庙记》：“今有庙学，亦尚昭圣治哉。”^⑥

翟祺《藕泽村孔庙记》：“藕泽里之有庙学，由藕塘宋思约者……

①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②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297页。

③ （元）张伯淳：《养蒙文集》卷3《处州路重修儒学教授厅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94册。

④ （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7《江阴重修学记》，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册，第544页上。

⑤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6《大元国学先圣庙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02册。

⑥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8，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册，第365页上。

自输己材，创建庙学。”^①

刘岳申《吉水州修学记》：“吉水乡校自至元中，县令多东鲁儒生，凡致美于庙学者，靡不毕用其至。”^②

虞集《武卫新建先圣庙学碑》：“吾卫庙学未立，师弟子教学无所……乃以庙学告成请于上。”^③

以上所引史料中的“庙学”分别指的是：处州路学、江阴州学、国子学、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儒学、藕塘里社学、吉水县学（吉水后改为州）、武卫军（元京师侍卫亲军之一部）儒学。此外，据《山左金石志》，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十九所盐场之一的西由盐场的儒学也称庙学。^④由此可见，元代庙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它几乎可以指元代出现的一切形式的儒学。胡务“庙学即儒学”的提法是有道理的。而程、欧二先生所提出的“与地方学校不同的”“确确实实的庙学”，则没有史料根据。

那么，为什么元代将儒学称为庙学？这主要归因于元代的儒学教育体制。

“庙学”一词由来已久，元代理学家许谦在《诗集传名物钞》中对蔡邕、贾逵等东汉礼学家将“庙学、明堂、灵台为一”提出批评。^⑤比许谦更早的东晋杜预在《春秋释例》中《庙室例》第十八《释例》中也认为：“太庙有八名，其体一也。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行禘祫、序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礼谓之明堂，行乡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物、望氛祥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合宫。诸儒皆以庙学为一，郑氏以为异处。”^⑥这样看来，“庙学”

①（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39，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本，第1册，第606页。

②（元）刘岳申：《申斋集》卷6《吉水州修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04册。

③（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3《武卫新建先圣庙学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清）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22《西由场新建庙学碑》，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册。

⑤（元）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晋）杜预：《春秋释例》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教育 士人 社会

一词可能出现于中国上古时期，到汉代诸儒已经不能知其详，出现了一些争论。北魏宣武帝时期，司空王恽提出在京师修明堂、辟雍的建议，宣武帝召诸臣讨论，大臣封轨的奏章中有“庙学之嫌”之句。^①大臣贾思伯也提出“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的建议。^②可见，西晋时对庙学的概念已经更加模糊。因此，庙学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已经不好考证。胡务认为“庙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文学家韩愈所作《处州孔子庙碑》中的“惟此庙学，邺侯所作”之句^③，这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唐代地方儒学大规模建立后，韩愈以“庙学”称当时新兴的儒学，给“庙学”一词新的含义，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唐代以来，文献中有关庙学的记录逐步增加，据《崇仁县孔子庙碑》，唐开元年间，“定孔子为先圣，庙而衮冕南面，每岁春秋祀焉，由是庙学之礼益备，凡有学者必有庙，示其尊也”^④。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庙学之制起源于唐代，它是庙与学二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孔庙是祭祀先圣孔子的场所，学校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地方，二者的合二为一是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与重视祭祀的传统（“天下大事，惟在祀戎”）的结合，表明了唐以来儒学教育的初步完善。这种唐代出现的庙学，至宋代逐渐增多，并成为定制。宋仁宗庆历年间诏天下皆立学，于是“凡郡邑无不有学，学无不有大成殿”^⑤。上述情况，可以从宋元的方志中得到印证，宋宝庆年间，庆元府（今浙江省宁波市）所辖六县的县学均为庙学。^⑥宋镇江府（今江苏省镇江市）所辖的三

① 《魏书》卷32《封懿传》。

② 《魏书》卷72《贾思伯传》。

③ 胡务：《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见《元史论丛》第8辑。

④ （元）吴澄：《吴文正集》卷50《崇仁县孔子庙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97册。

⑤ （元）刘壎：《水云村稿》卷3《南安路学大成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95册。

⑥ （宋）胡榘：《宝庆四明志》卷2《学校》，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册。

县县学包括府学在内也全为庙学。^①

元代庙学如何？首先看一下元人对庙学制度的看法。元代著名教育家程端礼认为：“孔子庙遍天下，其制度沿革多不同，然皆所以尊崇圣人而阐明其道，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同归于学，则一而已矣。是故殿廷庑门有常度，容貌佩服有常仪，尊垒簠簋有常数，师弟子有常员，祭祀有常礼，苟奉天子之命，司牧民之寄者，必有志于其间也。”^②元著名文士，曾任国子祭酒、翰林直学士的虞集认为：“夫庙无与于学也，然而道统之传在是矣，学于此者诵其诗，读其书，习礼明乐于其间，诚其道也。”^③上述看法反映了元人对庙学合一认识的深入。实际上，元政府对庙学的发展可以说是比较重视的，元代曾多次下达儒户免役和禁止骚扰庙学的诏令，南宋遗留下来的学田得到承认，南宋的一套学校管理和祭祀制度也得到继承和发展。这样，元代的庙学在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自国都郡县皆建学，学必有庙，以祠先圣先师，而学所以学其学也”^④。而庙学之制“莫备于今，诏书屡下，风厉作成，视昔有加，可谓盛焉”^⑤。

元代庙学的发展表现在庙学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区域和范围。在以前庙学影响从未达到的边疆地区，一些庙学建立起来。如云南，在至元十三年（1276）“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⑥。在距元上都七百里的弘吉剌部驸马封地全宁路，泰定二年（1325）“皇姑鲁国大长公主、驸马济宁王创建庙学”^⑦。庙学在元代也推广到一些特

①（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11《学校》，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元）程端礼：《畏斋集》卷5《枣强县学修饰两庑及从祀先贤像记》，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册，第67页下。

③（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8《新昌州重修儒学宣圣庙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6《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元）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9《义乌县学明伦堂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⑥《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

⑦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卷4《全宁路新建庙学记》，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册，第808页下。

殊的区域，如军队驻地、转运司治所、盐场以及乡里等等。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有一些地区存在有庙无学的现象，如山西的潞城县、垣曲县等，但这些地区后来逐步建立学校，完善了庙学制度。^①

二

元代庙学的结构如何？这是认识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是比较完善的，典型的庙学是国子学和地方路、州、县的官学，由于是政府办学，学田有一定的保障，经费相对充足，因此，其庙学的各项设施也比较完备。元代庙学有三部分：庙（也称礼殿、大成殿、夫子庙、文庙等）、学宫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庙以观其礼，学以育其士”^②，而教学辅助设施则是庙和学实现其职能的必要条件。元人虞集在其文集中将这三部分称为：礼殿、学宫和学都。^③庙位于学校的中心，一般是前庙后学、右庙左学以示尊崇。（元人尚右，但元代也有左庙右学的例子。）庙内塑孔子像，正中南面而坐，孔子以下为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东坐西向^④，十哲分列左右。庙的东西两边有从祀廊庑，绘七十二子像（后增至一百〇五人）于其中。由于绘画时间久，易模糊不清，北方一些庙学将画像画在布帛上，祭祀时挂出，平时收藏，元中后期江南很多地方则将绘画改为塑像。学宫由明伦堂（名称不一）、学斋及尊经阁组成。明伦堂居中为讲堂。学斋位于东西二庑之中，数量为偶数，对称排列，是诸生修业诵习之

①（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8《潞城修学记》、卷29《垣曲文庙记》，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本，第1册。

②（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33《高平归正学田记》，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本，第1册，第477页下。

③（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5《奉元路重修先圣庙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孔庙中四配东坐西向，最早出现于北宋，此后延续下来，元朝礼部经过讨论，仍然维持东坐西向的制度。详参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第四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所。也有一些学校将学斋设于学校东西两侧的僻静之处，以利于诸生修习。尊经阁在明伦堂之后，为学校藏书度经之所。庙学的第三部分为辅助设施，包括：会食之堂、仓庾（库）、直舍（宿舍）、学官之厅、浴室（溷）、碑亭、杏坛等。庙学周围有围墙，外为棂星门，内有学门，学门里面凿湖为泮池，池上修桥通往孔子庙。关于元代庙学建筑结构，笔者有专文论及^①，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除国学及地方路、州、县庙学以外，元代还有其他形式的庙学，如社学、义塾、军队及转运司庙学等。它们有的为私人办学，有的虽是官办，但分布不广，数量较少，因此，其庙学的规模远逊于国学及地方路、州、县学。

元代社学的数量很大，至元二十三年（1286）大司农司上奏说，全国有社学 20 166 所。五年以后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社学数量增至 21 300 余所。^②但有关元代社学的详细史料并不多见。据《藕泽村孔庙记》，该村的社学“正殿两庑轮焕翬飞，流丹耀碧，像貌俨然，门阶悉备”，其西边“文构讲堂，为弦诵之所”。此处社学虽然简陋，但是有庙有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春秋二祀则“行释奠之礼”。^③因此，可以说它具备了庙学的功能。

元代的京师驻军及地方驻军中，都有设置庙学的记载。据《元史·职官志》元代侍卫亲军诸卫中设置有儒学教授一职。由于“凡卫必有营，营有城郭、楼堞、门障、关禁、官治、行伍庐舍、库庾、衢巷，而特立先圣孔子之庙，儒学在焉”。驻地在涿州的武卫庙学，“广袤八十亩”，有“礼殿以奉先圣像，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从祀，十哲分位殿中东西乡〔向〕，七十二弟子绘庑下”，其“讲堂、斋庐、

① 参见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学的建筑布局考述》，《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72页。

② 《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卷16《世祖纪十三》。

③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39，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本，第1册，第606页上。

庖廩、垣墉、门术皆如常制”。^①位于湖广行省南部的武冈路儒林乡的城步寨，是元政府屯兵以镇抚苗、侗等少数民族的八十四团之一部的驻地，皇庆二年（1313）这里也建立起庙学，“正殿、讲堂、门径、斋庑、墙垣、厨壁，内外完具，先圣先师十哲从祀塑绘有严，庙貌相称”^②。

义塾也是元代分布较广的一种庙学形式，它是由私人捐资修建，因为其规模不大，并大多处于州县治所以外的乡里，一般方志将其作为社学对待。义塾在教学方面与社学并不相同，它是“延儒师，招来学”^③，与书院相似。义塾的建筑规模不大，如上海横溪义塾，有礼殿供奉孔子及四哲像，“设两斋栖师弟子，具祭器，严春秋二丁”^④。安福州的安田义塾也是“构礼殿奉先圣先师，设堂立斋舍，门庑庖廩悉具”^⑤。而嘉兴县的戴氏义塾规模较大，“广袤可二十亩”，有“先圣先师之殿峙其中，论堂踞其后，斋庐翼其旁，邃庑穹门下至庖湑库庾直舍之属，为屋四十有五间”，并且其“图史之藏，什器之须，钁悉毕备”。戴氏义塾设有围墙，并种花木、引溪水于校园，环境非常优雅。^⑥

元代的都转运盐使司及其下属盐场也有创办庙学的记载。据《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新作孔子庙记》，在其治所山西（属中书省辖区）运城县的路村，大德三年（1299）建立了庙学，内有礼殿，塑先圣先师之像，“置讲堂殿后以居师生”^⑦。庙学有围墙和棖星门，庙学设施基本完备。

①（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6《儒林书舍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下。

③ 崇祯《松江府志》卷23《学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④（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11《上海横溪义塾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元）吴澄：《吴文正集》卷41《安福州安田里塾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97册。

⑥（元）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0《戴氏义塾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8，辽金元石刻文献全本，第1册，第364页下。